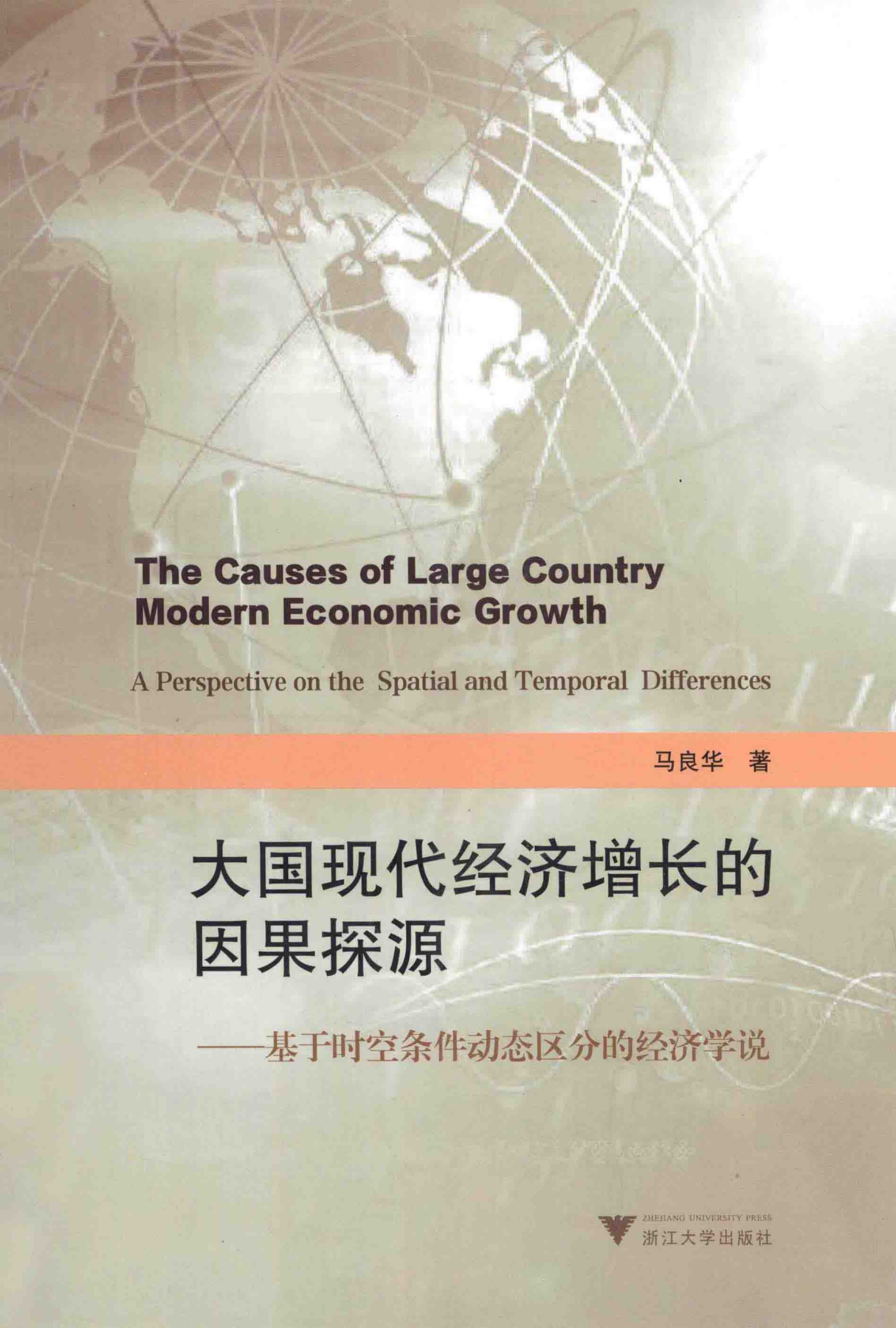




# **The Causes of Large Country Modern Economic Growth**

A Perspective on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Differences

马良华 著

## **大国现代经济增长的 因果探源**

——基于时空条件动态区分的经济学说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 **The Causes of Large Country Modern Economic Growth**

A Perspective on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Differences

## **大国现代经济增长的 因果探源**

——基于时空条件动态区分的经济学说

马良华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国现代经济增长的因果探源:基于时空条件动态  
区分的经济学说 / 马良华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4.5

ISBN 978-7-308-13082-0

I. ①大… II. ①马… III. ①经济增长—研究 IV.  
①F06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67778 号

大国现代经济增长的因果探源

——基于时空条件动态区分的经济学说

马良华 著



责任编辑 傅百荣

封面设计 项梦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省良渚印刷厂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9.25

字 数 346 千

版 印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3082-0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bbs.tmall.com>

# 前言

---

想写这样一本书的念头，由来已久。尽管书名在期间变了好几次，但主题却是一直明确的，就是要探寻一个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后起人口大国的经济是如何才能实现持续的增长发展的，或者如何才能真正成功地从欠发达的状态发展达到发达的状态。试图作出这一努力的动力，主要来自于久存于心中并且日益增强的对已有发展理论中一些解释的疑问、对中国研究现状的忧虑以及出自内心的依然怀有的发展理想，还有个人想要探究真相的固执。我自知我这样做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和困难：除了需要认识反思现存发展理论及其应用中所存在的局限或者缺陷之外，还需要提出具有独立的、创新性的并更具解释力的认识框架及理论体系。事实上，提出问题或者作出批判与评价总是要远比解决问题和追求更加合理要容易得多，尽管这两个方面对于理论的创新发展都十分重要。此外，面对已经习惯于追随西方理论主流并形成主导性影响的国内学术研究环境，试图作出这样一种独创性的努力和改变，无疑需要很大的勇气。要想改变人们已经拥有的固有思想和习惯——即使的确是一些不合理的存在，或者接受一种与原来不同甚至相左的新的认识思想和观点，总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人性及其行为选择中表现出来的惯性或者诺思称之为“路径依赖”的东西，同样反映在影响经济体社会经济变迁的复杂性之中。但我依然愿意不自量力地进行这项尝试，不仅是出于理想，也是基于职业，多少还带有一些好奇。

关于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探究，因为一直是各国经济学者们的重点，相关文献已是汗牛充栋。且不说经济学中的各种原理、理论或模型等，就是专门的

研究阐述,也已经不胜枚举。从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到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当然也包括新经济增长理论和制度经济学理论,以及发展经济学理论,著名的就有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库兹涅茨的《各国的经济增长》、缪尔达尔的《世界贫困有挑战》,还有刘易斯、舒尔茨、诺思等等的研究,涉及经济增长因素、制度、行为等多个方面的著述及理论,研究对象覆盖了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有些至今仍被奉为经典。这些理论为人们提供了认识和理解经济增长或发展的思想基础、系统框架和方法,并具体地解释了决定国家经济持续增长或发展的主要因素——或者发达状态或欠发达状态在这些经济技术因素和非经济技术因素的各种表现特征,以及与此相关的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劳动、技术、资本(以及人力资本),或者生产率、贸易、教育、收支等总量、结构和增长率方面的经验证据。然而,尽管经济发展理论在发达或不发达状态的特征描述和成因解释上取得了丰硕成果,但解释过去和指导现实从来都不完全是同一回事。成功者自然会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和原因,但发展的时空背景却总是处在动态的变化之中。事实上,在用以指导欠发达国家摆脱贫困并实现工业化的实践上,主流经济理论至今没有取得令人信服的成果,其适用性也屡受质疑和诟病,包括依循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据与经济理论的发展经济学和诸如“华盛顿共识”等等。在现实中,一些按照西方发展模式达成的“共识”努力发展经济的国家成效不佳,而一些不完全按“共识”运作的国家如中国等东亚国家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是否意味着现有主流理论在经济发展方面存在着“似是而非”或“似非而是”的认识?或者,从长期视角,这种理论与实际的背离是短期的现象,还是长期的趋势,仍然难以断定。也就是,长期的经济发展绩效——或者相对于现代化实现的目标或长期持续增长的重要性,国家间短期“成败”的影响依然存在较大的变数。就像长跑比赛中选手在途中的表现一样,在到达终点之前,胜负依然难定。然而至少说明,现有理论在对一国经济系统的认知和理解上仍然存在不少局限或者有待进一步探索的问题,就像诺思教授在其《理解经济变迁过程》一书中所指出的,“经济学范式——新古典理论——并非为解释经济变迁的过程而创立。我们生活在一个不确定的并且不断变化的世界,这个世界不停地以全新的方式深化。理论在这种背景下解释力有限”<sup>①</sup>,“……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我们误解现实的概率远比正确理解现实的概率大得多,因而认识现实的本质就很重要。”<sup>②</sup>有关国家长期经济的增长发展,我们

① 道格拉斯·诺思:《理解经济变迁过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② 同上,第5页。

面临的问题仍然很多。

国家的发展是否存在通用的模式？为什么有些国家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保持了持续的增长而另外许多国家却至今难以摆脱贫困？西方发展经济学为什么不能很好地产生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指导作用？“华盛顿共识”的问题出于何处？发展中国家如何才能取得持续的发展业绩？后起发展中国家如何才能真正地利用好自己的后发优势？对于不同的经济规模、体制基础、文化背景、国际背景等的国家，应该如何认识和理解其不同的发展路径和模式？像中国这样的超级人口大国快速的经济增长能够保持持续的状态吗？等等。对于这些问题，尽管已有的说法很多，并且“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充满争论。或许这正是问题的真相——虽然成功在事后大多都表现出一些共同的特征，而若要形成这些特征却远比归纳、解释这些特征更为复杂和艰巨；除此之外，一些成功的特征在获得成功之前，往往充满争论。另外，发达状态的经验证据虽然是发达国家取得经济发展成功的关键所在，而恰恰正是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面临的现实障碍，有些甚至在短期内是无法逾越的障碍。或者，一旦欠发达国家具备了发达国家的成功“表现特征”，也就不会是欠发达的状态了。这就是一个悖论。

## 二

当我们面对发达国家在社会经济所达到的非凡成就时，我们不仅需要认识了解这些发达国家在实现这些成就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共同特征，而且需要认识理解形成这些外在特征的内在根源及其动态过程。人们经常为一些成功的表象特征所吸引，却忽略或者忽视了更加重要的本质问题及其系统条件——特别是那些区别于其他经济体的独特“品质”及其形成的漫长历史。

遗憾的是，现代经济发展理论告诉人们的更多的是关于发达国家的成功历史及其特征——尤其是反映在外表的包括增长表现及其相关的结构、资本、人力资源、技术或者生产率和制度等等被称之为增长源泉的东西，并为一些难以解释清楚的“源泉”或因素不断地尝试解释的方法——例如某些被称为模型拓展的东西。尽管如此，问题似乎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由于结果经常取决于模型的设计和度量方法，新的解释仍然难以令人信服。而从因果逻辑关系上，那些被称之为源泉的东西，包括资本、技术、人力资本、知识、制度等等及其

决定的生产率或者竞争力,虽然的确是决定经济体经济发展绩效的关键因素,但在社会经济这一复杂的系统演化过程中,它们本身也是一些“中间变量”,并不能系统揭示经济发展绩效的真相。这些看起来至关重要的“中间变量”本身的形成,取决于作为经济行为主体特别是企业组织的行为选择、市场结构和环境条件,不仅涉及许多社会经济政治等多元因素错综复杂的交互影响和累积关联作用,而且即使在一国政府适当的管理假设之下也仍然需要足够的时间过程和一定的运气。因此,现代经济发展理论,如果说它们的确对于揭示国家的发展问题作出了重大贡献,那么这种贡献更多地集中体现在对于西方社会或者发达国家的成功历史和经验的研究及总结描述上,再加上在行为制度稳定的条件下对于经济体面临的发展矛盾的现实研究上,或者体现在以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和理论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象和存在问题。除了上述提到的局限之外,现代经济增长发展理论对于增长发展绩效形成至关重要的因素或要素——诸如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劳动、技术、制度等等及其内涵变化发生作用的时空背景、这些要素及要素组合在重要性顺序上的时空差异以及逻辑依据的研究上也明显不足。人均产出水平与结构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关联性,但在不同增长状态或工业化水平国家之间的关联表现并不一致,即虽然人均产出水平处于相同或类似级次,但在处于快速增长、低速增长、增长停滞或衰退的经济体之间的结构表现并不一样。此外,如果单纯地从结构比例而言,许多国家在工业化初期的结构也存在着与发达状态时类似的比例特征。在多国样本增长的统计研究中,按照人均产出水平分类所得出的结果还容易被不同的时空状态所平均化而失去代表性。因此,简单地用人均产出水平来认识结构的合理性,也会导致相关认识上的重大误解。

而对于许多欠发达国家——特别是那些具有不同的时空背景条件的国家而言,那些对于经济发展绩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中间变量”性状的形成,本身就是一些短期内难以逾越的发展障碍。如果欠发达或者发展中国家的精英们,只是看到了这些诱人的“中间变量”而忽视了决定这些“中间变量”持续改善的基础条件或者系统结构之间的内在联系,当他们提出建议或者作出决策“大力”塑造这些“中间变量”试图在很短的时间内形成具有与发达经济体同样的水平时,那么他们就会掉入“美丽的陷阱”——得到的更可能的回报是事倍功半或者欲速不达!如果他们不顾时空差异盲目地追随或者套用发达国家的前沿理论和方法,或者舍弃自己的“年轻”优势而反而去追逐那些“夕阳的光辉”时,则就像中国古代寓言中“东施效颦”——把“西施”因为“心痛病”而出现的皱眉当作



“美丽”的特征一样,学错了地方。东施盲目模仿至今令人耻笑,发展理论研究和实践上的盲目追随或“刻舟求剑”以及“拔苗助长”现象同样值得反思。然而,这样的例子在现实中屡见不鲜,比比皆是。

我想表达的是,认识发展的影响因素或者主要源泉和判断现实所处的发展水平固然重要,然而更重要的是搞清楚这些推动或阻碍发展的因素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如何才能切实有效地提升自己的发展水平。如果我们想要更加有效地推动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我们需要更加系统深入地探究社会经济的变迁问题,需要更加系统和深入地理解其内在的逻辑,以努力减少因认识上的“一知半解”或者“一叶障目”给我们带来的尴尬或者困境。

### 三

要想使得认识更加贴近问题的真相,减少我们对于增长发展问题的误解,我们不仅需要突破已有增长发展理论和研究中所存在着的局限或缺陷,而且还需要提供一种更加系统并具有时空区分的认识框架和理论体系。为此,我们需要更加系统深入地研究经济增长发展问题所具有的复杂性和科学前提,并对现有增长发展理论和研究进行检讨和反思。

在本书中,基于本人多年来对于经济发展问题已有研究状况的关注观察、反思和研究认识,我提出了国家发展生命周期理论和系统时空动态区分理论,或者可以称之为时空经济学,并进行了比较具体的探索性阐述。我试图在自己的理论思想和汲取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在理论和实践之间构架起一座系统认识 and 理解的桥梁,提供一个具有时空意义的动态认识坐标和逻辑框架,为系统认识理解经济体的长期经济变迁发展过程及其出现的重大经济矛盾或问题提供新的视角、新的理论框架及依据。以此为基础,在各章的内容中,我进一步研究探索了经济体长期经济发展的外在表现的系统根源,或者多元要素之间的动态联系,把视野拓展到传统生产要素或者“中间变量”之外更广的范围和更深的层面上,来认识和理解影响经济发展绩效及外在表现的系统框架和动态特征,以突破传统研究和认识上过于线性化、静态化和零碎性等局限。并从动态演化视角进一步探析结构、资本、人力资源、技术或者生产率、竞争力和制度等等决定性“中间变量”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和动态条件。所得出的许多理论认识和观点,包括对于结构变化、增长空间、经济危机、经济衰退、政府管理、制度变革等



等有关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超出了传统主流发展理论的解释范围,甚至完全不同。然而,本书的目的并非是要否定已有的现代经济增长发展理论,而是想要在反思已有理论和研究中所存在着的局限和缺陷,以及汲取前人思想包括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及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一种更加贴近现实和具有解释力、预测力的新的认识视角和理论框架。事实上,书中许多的理论思想都得益于已有各种研究的成果及其启发,包括一些来自于人文社科和自然等等方面的具有代表性的经典理论和研究的启迪。

我的研究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和鼓励。在这里,我首先要感谢我已经年迈的母亲的支持,她不仅和我已故的父亲养育培养了我,而且给予我自始至终的关怀和理解,给了我很大的精神力量;其次,我要感谢我亲爱的太太龚淑英和女儿马心悦,没有她们杰出的工作和学习努力,没有她们的支持和理解,我很难想象能够坚持下来完成这一研究;再次,我还要感谢我其他的亲人、朋友和同事的支持,是他们给予我完成这项研究的信心和动力。另外,我要感谢浙江大学出版社,感谢傅百荣编辑的辛勤工作和热情支持,是他的敬业态度使得本书得以顺利出版;感谢史晋川教授、杨柳勇教授和曹正汉教授的鼓励以及对书稿出版的关心和支持。最后,我要对我近年来所带的研究生们表示感谢,他(她)们为我收集了部分我研究中所需要的跨国历史数据——我知道这项工作的挑战性和枯燥,并以他(她)们的自觉努力和优秀表现有力地支持了我的研究工作。

我相信,我所从事的工作具有开创意义,尽管仍然存在遗漏和不足,并会引起争议和分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许多人共同的努力,本书中所提出的认识框架、理论体系和方法将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所认可。

马良华

2013年11月于杭州

# 自序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现代经济增长发展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其涉及的范围拓展到生产要素及制度的更深领域和更为宽广的视野,形成了许多对经济增长发展问题的研究成果,不仅表现在对于发达国家经济的长期增长、短期增长问题的研究探索上,也表现在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发展研究上。这种趋势至今仍在延续。原因在于,在一个日益开放的系统下,经济体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关联前所未有。这不仅改变了过去相对封闭背景条件下各国的增长发展环境条件,特别是诸如资本、技术和自然资源中受空间自然条件限制以及发展基础限制较大的增长发展要素的状态,而且也改变了具有强烈的路径依赖或者习惯特征的作为行为选择决策重要依据的制度环境的演化条件。此外,在主流崇尚的比较优势或者被称之为“自由贸易”主导的国际经济政治格局下,还意味着增长发展潜在空间的相互挤占或拓展——在发达国家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领域特别是市场空间可能被发展中国家挤占的同时,发展中国家在具有较高附加值特征的产业领域及环节或市场空间更面临着被发达国家挤占压缩或侵蚀的现实。事实上,二战以后,这种状况已经变成现实。也正因为如此,与此前漫长的岁月相比,竞争博弈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程度不断增加,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也明显地增强了。虽然市场主导思想在发达国家和世界经济中依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毫无疑问,即使在发达国家,包括欧美主要国家,政府在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被强化了。

除了开放及经济联系增强等所引起的增长发展环境的变化以外,最近五十年中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和快速发展及扩散应用,也大大改变了经济增长发展的时空条件。世界社会经济发展现实的深刻变化,使得一些经济发展理论据以支撑的基础发生了动摇,一些原来有效或者具有较强解释力的理论学说和发展“经验”不再具有以往的适用性,包括在发达国家;而一些原来并不具有适用性

或者缺少理论支持的实践却得到了不错的效果;对于发展中国家则更是如此。而造成这种局面发生改变的奥妙,就在于“时空”两字。时空的动态差异,以及假设条件的变化,使得在发达国家中发生效力的一些理论或经验在发展中国家“失效”,也使得发达国家在过去发生效力的一些“经验”不再那么“灵验”。这既对已有经济发展理论提出了挑战,也给迄今为止经济发展理论中一直短缺的“系统时空动态区分”理论发展带来了很好的契机。

本书创建的系统时空动态区分理论,或者时空经济学,是从经济系统整体的运行视角出发来探索经济体长期经济(或现代经济增长)增长过程中“时空”差异——发展生命周期阶段、空间“基因”特征和共生环境的不同所导致的对经济增长发展空间特征、发生决定性影响因素存在性状及重要性顺序等的差异对社会经济变迁的深刻影响,以及所导致的经济运行矛盾特征、结构、竞争优势等方面上的差异。认为,经济发展是系统演化变迁的反映,具有很大的复杂性,既涉及多元要素的互动关联和累积循环效应,又面对经济增长发展的时空差异和“非各态历经”现实。期望通过一种静止的、零碎的理论方法,难以得出对经济增长发展问题深刻的系统认识,而孤立、时空割裂、时空异位的分析方法,<sup>①</sup>更会在理论和实践上导致很大的误解和误区。

在数十年来对于经济问题的研究探索中,随着我在理论学习、实践和研究探索上的不断增进,当面对和阅读各种各样的研究文献及不同结论和现实矛盾时,我的困惑与日俱增,对现有的一些经济增长发展理论和方法在适用性上的置疑也越来越多。这些困惑或置疑包括但并不全部包括如下:

1. 为什么在过去二百年中,特别是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差距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致力于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背景下依然呈现出总体的扩大趋势?尽管我们总是能够找出各种各样的原因来解释这种现象,但这些解释具有足够的说服力吗?

2. 为什么以西方发展经验为基础的致力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发展经济学在实践中没有得到相应的实绩回报,而一些有悖于西方发达国家经验和缺乏西方主流理论支持的发展实践(特别是像中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东亚

---

<sup>①</sup> 时空割裂,是指在涉及时空一体的经济发展问题时,把经济体的发展阶段(如人均产出水平)与发展背景(如市场条件、制度条件等等)条件分割开来而仅仅考虑其中一个方面的因素的分析方法;时空异位,是指在一国的增长发展问题研究和多国比较研究时,把处于不同背景条件或者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增长发展问题放在一起进行类比的作法,例如,用A国那个阶段的增长发展问题与B国这个背景的增长发展问题进行类比。

国家或地区)却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一些与传统理论背离的结果?

3. 从社会经济的变迁角度,如何认识和理解长期增长发展的外在表现与多元因素之间的内在关联关系?包括经济增长实绩及波动、结构形态、竞争力以及被视作为其他重要变量的决定性因素的制度、政府管理等等与社会、经济、政治和共生环境之间的互动关联影响?

4. 与3点相关联的问题是:在更加开放的竞争博弈环境中,彼时彼地的“经验”和理论是否仍然适用于此时此地的增长发展?哪一些依然具有和为什么具有适用性而哪一些不再适用及为什么不再适用?产业结构的高度服务化和高度虚拟化意味着什么?

5. 对于后起发展中国家而言,在充满竞争博弈的环境中,“后发优势”果真能够带来跨越式发展吗?如果能够,那么表现在多大的程度和多大的范围意义上?其前提又是什么?相关的问题是:现代化具有捷径吗?民主是否意味着发展?作为理想的制度,什么时候实行民主制更加有利于一国经济的增长发展?自由贸易真的能够带来发展吗?

6. 为什么现代经济增长发展理论在实证上经常出现结论上前后不一致性的矛盾或者不同研究之间的不同结果?每当理论和实证对于经济增长发展实绩的解释上又取得了新的进展时,是否意味着这种新的解释更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对于西方国家经济增长发展理论实证的新的进展同样适用于处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发展中国家吗?哪一些可能适用哪一些又不适用?为什么?

7. 主要发达国家在21世纪现阶段所出现的经济危机或者经济衰退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与此前所发生的经济危机在形成原因上相同或相似吗?为什么?一些发展中国家在长期经济增长发展过程中被称之为“中等收入陷阱”或者“早衰”的现象,其根源或成因又是什么?在看似相同或相似的各种经济现象中,哪些具有共同性的根源?哪些又是属于本质明显不同的问题?

8. 怎样来认识和理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发展和面临的问题?现阶段中国处于哪一个发展生命周期阶段?其“生命特征”及其表现的矛盾特征是什么?国家的战略管理应该着重解决什么问题?为什么?在中国经济增长发展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应对上存在着哪些值得检讨反思的地方?经济发展理论创新与突破的方向何在?

这些困惑和置疑进一步增强了我对经济增长发展问题进行系统探索的好奇和动力。在过去的许多年中,兴趣和固执使我经受了各种寂寞、诱惑和外部

压力的考验,我把几乎全部的精力和时间投入到这一主题的自主研究探索之中。为此,在已有的学习研究基础上,我进一步收集查阅了有关过去一百年以及更早的世界经济发展历史及统计资料,包括世界和主要国家在总量和结构上的历史经济数据,阅读了许多与经济增长发展密切相关的经济技术因素和非经济技术因素特别是制度的长期变迁方面的经典文献,以及一些对于人性这一话题的文献阅读和思考,阅读了有关经济增长发展的经典理论和研究文献。这些数据资料和文献为我在这一主题上的研究思考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启发,我仔细地对这些理论思想和观点主张进行咀嚼区分,努力汲取其中的精髓与养分使之成为我认识和理解经济体长期经济增长发展或变迁的部分依据。在此基础上,我不断思考探索,以期在各种不同甚至是矛盾的表述中和似是而非的解释中,以及各种不同的经济表象和矛盾结论中发现问题的内在根源及其逻辑关联,努力探寻更加贴近现实或更具说服力的答案。

值得欣慰的是,我在研究探索上的努力终于取得了进展并有了成果,在经济增长发展问题上形成了一种新的认识视野和理论体系,我把这一研究成果称之为“系统时空动态区分理论”。这一理论的核心是“国家发展生命周期理论”和“现代经济增长系统认识体系”。“现代经济增长系统认识体系”以现代经济增长绩效为出发点,根据不同属性和逻辑关联特征对各种重要影响因素进行重新归类,形成具有系统关联和逻辑关系的各组重要变量,提出了现代经济增长发展绩效形成的系统关联认识框架体系,用以解释说明国家长期经济增长实绩形成的复杂性、关联性、累积循环效应和约束条件。“国家发展生命周期理论”,是在提出国家发展生命周期理论假设基础上,从时空两个方面,对现代经济增长长期过程中影响增长绩效表现的各种重要因素或者各组重要变量的存在性状、关联特征、系统影响等,对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生命特征”和矛盾特征及其演变,以及对增长绩效表现差异及其内在根源和因果逻辑等进行的系统研究和关联探索。这两个方面共同构成了具有“时空”意义的理论认识体系,时间主要是指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空间主要是指国家发展的社会文化、资源要素、“遗传基因”和共生环境等方面的条件。时空差异,在时间意义上意味着时间的变化或发展阶段的差异,在空间意义上意味着经济体的不同和发展实在的差异。时空的不同,导致了发展水平、环境条件和面临的主要矛盾,或者发展禀赋条件和行事方式的不同,包括经济体规模、劳动、资本、技术等要素结构条件,以及社会文化、习惯、信念、管理传统和制度实施特征等等。

在本书的第一章导论中,我在最近一百多年的历史统计数据及资料基础

上,从长期视角出发对世界经济整体的格局及主要国家相对地位影响等的变化进行了分析评述,并提出问题;同时,对最近三十年世界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格局变化及可能的趋势进行了研究探讨,对本书的研究设想、理论探索和观点进行了扼要阐述,作为全书各个章节内容探讨的理论和实践背景。

在第二章中,我对已有经济增长发展理论和实践中面临的主要困惑做了概括总结,包括发展经济学和主流经济增长发展理论及研究中面对的困惑,探讨了理论与现实之间存在的各种矛盾。同时,结合发展中国家的主观意愿、理论倾向和实践操作状况,重点讨论了“现代化是否存在捷径?”“民主是否意味着发展?”和产业政策的有效性等问题。认为,理论和实践中面临的困惑,主要源自理论与现实发展条件之间存在的矛盾,许多的研究在借鉴“经验”和进行理论应用时,过多地夸大了主观的能动作用(例如计划推动和政府干预等)而忽视或轻视了现实的条件约束,更多地看到了经济实绩表现所伴随的诸如结构、技术、竞争力、制度等等各种表现特征,但忽视或轻视了导致这些“中间变量”从量变到质变的更为系统、深刻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之间的内在互动关联影响及其演化所需的连续、渐变和累积的时间条件,忽视了“后发劣势”即制度性因素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约束影响。

在第三章中,我对现代经济增长发展理论和研究所面对的复杂性问题进行了分析探索和阐述,认为经济发展问题所涉及因素的多元性及其互动关联和累积循环效应,以及发展条件的时空差异和“非各态历经”现实,是经济发展理论及研究进行科学探索的重大障碍。现代经济发展理论在解释和探索过去的经济增长实绩源泉方面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发展问题和短期问题上的研究已经形成了许多成果,在历史数据的统计描述和检验及跨国比较等方面形成了许多成果,但整体仍然表现出一种零碎、静止和缺乏时空条件动态区分的特征,这进一步导致了系统一致性的缺乏。这种主要依循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背景条件和主体逻辑起点的现代增长发展理论,不仅导致了经济增长发展理论在解释上的“时滞”缺陷和预测力上的不足,而且导致了理论适用性上的严重局限。本章对这些局限性以及理论与方法上的缺陷进行了反思总结,对中国在经济发展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上存在的盲从性和创新性的缺乏提出了批评,并指出了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建立自主性经济发展理论体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及创新突破的方向。

在第四章,我构建了一个“现代经济增长系统认识体系”,把现代经济的经济增长发展表现理解为是由一国的供求拓展空间、要素结构条件和经济运行循环及

其共生环境、政府管理和制度因素等共同作用的结果,以此反映对经济体长期经济增长发展实绩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主客观因素条件(或变量)框架及其互动关联和累积循环关系。同时,进一步解释或说明了这些决定性变量所指的特定含义、功能、状态及其形成的类型和关联影响。为了更加明确地阐述我对经济增长发展问题的系统理解,我还对其中有关社会经济变迁的特征问题进行了重点阐述。

第五章是国家发展生命周期理论,是“系统时空动态区分理论”的核心内容。在本章的第一节,我首先提出了国家发展生命周期的假设,并对这一假设的逻辑依据进行了系统阐述,认为国家发展的生命周期阶段及其特征的形成,是由经济体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生理”和“心理”的发育程度共同决定的。不同的“生理”发育程度和“心理”发育程度,形成了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特征”和发展“矛盾特征”。不同的经济表现(实绩、波动、结构、生产率、竞争力等)既是“生理”或“心理”发育条件和经济运行循环所需条件之间的矛盾反映,也是“生理”与“心理”两个方面之间发育程度上的摩擦冲突的反映。因此,有些表面上看起来是相同或相似的经济现象或问题,在根源和性质上并不一定相同。如果不加以区分,就会导致应对上的重大失误。在第二节中,我对国家发展的生命周期阶段特征及其演变进行了探索阐述,通过回顾总结发达国家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恩格尔系数变化与经济表现之间存在着的联系,定义了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的大致起始标准,着重探讨了生命周期发育阶段及其前半期、后半期和成熟阶段、衰退阶段的“生命特征”和发展的“矛盾特征”及其演变中的可能结果。在第三节中,我重点对国家经济的理论成长空间及其现实转化条件进行了研究探索,阐述了我对经济体理论增长空间及其决定性因素和现实转化条件的认识观点。第四节则是从长期视角对世界上主要国家重要经济指标动态变化的总体概括,并对不同类型国家的经济增长绩效及差距,加以系统联系的时空区分和分析探索。这一章的理论,不仅是其他各章的理论基础,也是我对“中等收入陷阱”或“早衰”以及“经济危机”、“经济衰退”等问题进行系统认识和理解的基础。

在第六章中,我对产业结构变迁及其动因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述。我对人为夸大政府在干预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作用而忽视产业结构演变所需条件的做法表示不安。我认为,后起国家政府的确可以在产业发展等方面有更多的作为,但如果缺乏对产业发展特别是结构变迁在时空条件上的足够认识和理解,政府干预很可能造成产业结构的更加扭曲和对市场机制在资源要素配置上基础功能的极大损害。为此,我在第一节中用一定的篇幅来强调对产业结构变



迁及实质进行系统动态认识和理解上的重要性。为了比较具体地阐述我的观点及依据,我在这一节的剩余部分,解释了长期经济增长过程中产业结构的演变动因,指出了产业结构演变影响因素的多元性和交互性,并探讨了产业结构演变的动态特征、空间特征和动因分解,以期为人们对于产业结构的变迁过程提供一个系统动态的认识和可供选择的干预路径及方式。同时,对于人们长久以来形成的对于发达经济体产业结构高度服务化及高度虚拟化现象的崇拜和追求,我从国家发展生命周期理论出发,在本节提出了另类的解读和思考,认为产业结构的高度服务化和高度虚拟化现象,既是发达状态的一种表现,也是生命周期走向“老化”的反映。21世纪现阶段出现的以金融、债务为核心的经济危机,就是相关经济机体“生理”和“心理”老化导致的结构严重失衡的结果。后起发展中国家如果盲目“跨越”发展,就会导致效率与公平的严重缺失,甚至导致“早熟”和“早衰”陷阱。在本章的第二节,我进一步探索了与产业结构密切关联的生产要素结构及层级方面的动态变化,论述了生产要素结构及层级及其相关的更为深层的基础条件对于产业结构变迁的重要影响,强调当我们面对发达国家的发达产业结构形态这一强大的诱惑时,我们能够做的或者更为有效的产业结构干预路径,其实不是通过公共权力将资源分配到我们所期望的产业上以人为地改变表面的结构比例,而是分配到那些真正属于政府基本职能范围内对于产业结构变迁(或者转型升级)更具普遍意义的公共基础条件的改善上,包括教育、培训、保障和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及公共利益的维护等方面。为此,我对发达国家的这些方面开展了长期视角的关联探析,并加以动态时空区分。

在第七章中,我对另外一个时髦的话题——开放体系下的国家竞争力问题进行了探讨,以我长期以来对这一主题的关注、调研和思考,我在第一节中对国家竞争力及其时空表现进行了探讨,提出了我对这一问题的动态认识。认为国家竞争力是由经济竞争力和产业竞争力这两个既存在重要关联又存在区别的竞争力的综合作用结果。在第二节中,我探讨阐述了经济竞争力和产业竞争力的本质及其动态表现问题,讨论了产业竞争力的层级、层级的形成及其动态转换特征和条件,认为产业竞争力是由稀缺性所决定的市场表现,不同的稀缺性对应着不同的要素复合性,竞争优势提升转换需要不同条件的配套支持。同时,对企业竞争力的本质进行了探讨阐述。我认为,从系统时空差异动态区分角度来认识,国家竞争力是与经济增长空间和管理效率密切相关的发展能力。由于动态比较优势的不同,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拥有不同的竞争优势,尽管从绝对意义上不同的竞争优势之间存在着高低优劣之分,但相对于自己的发展条

件而言,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并持续地致力于决定比较优势动态变化的因素的改善无疑是最为实际可行的发展路径。同样,在最后一节,我从长期视角对主要国家竞争力的时空表现及相互间的差距进行了分析阐述。

在第八章,我着重从国家生命周期理论角度对经济危机的本质和管理问题进行了探索论述。第一节,我用生命周期理论对经济危机的形成作了另类解释和分析论述,认为尽管引起危机爆发的诱因不同,但经济危机在本质上是经济体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时期中的内在矛盾冲突的外部表现,是经济体不同生命周期阶段过程中“生理”、“心理”特征与发展条件之间矛盾冲突和相互间动态不匹配性的结果,并与政府管理和共生环境密切相关。并认为,不同发展阶段过程中危机的类型、特征和性质有着明显的区别,危机管理所面临的困难也不同;政府可以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手段平缓经济波动或延缓经济危机,但如果不能有效地解决产生危机的“生理”性根源及其相关的制度调整障碍,经济危机的爆发就无法避免。在第二节,我进一步阐述了经济增长空间与经济危机之间的关系,认为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过程的经济体具有不同的潜在增长空间,一旦潜在增长空间的拓展受阻,便会传导到经济运行循环,表现出经济波动甚至经济危机现象。同时,我对政府的危机管理进行了探讨,结合逻辑和历史论述了政府危机管理的主要路径,提出了“换盆”理论。第三节,对上个世纪以来影响较大的主要危机进行了回顾并加以时空上的分析和动态区分。

在第九章,我对政府在经济增长发展中的作用这一老话题进行了探讨阐述。认为,尽管我们已经知道市场和政府都存在着“失灵”或“失效”缺陷,但当我们面对现实选择中两难困境时,我们是应该放弃政府干预而让市场自然地成熟进而增强对资源配置的效率还是默认政府干预的缺陷让其发挥对于经济资源的配置作用?如果是两者的兼顾或者分工,那么一个能够兼顾效率与公平的边界在哪里?经济理论及其包含的公共政策理论无疑对此提出了许多经典的主张,但当我们面对发展中国家所存在的各种现实矛盾时,我们很难简单地按照理论的框架和原则在市场与政府中作出取舍,而二战以后不同取向国家在经济绩效上的表现差异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理论与实践面临的纠结和矛盾:严格地按照西方发展经验或者诸如“华盛顿共识”及其扩展的“行动原则”国家的发展实绩远不如一些按照自己的模式管理经济的国家(如东亚的一些国家)。为了解释诸如此类的问题和阐述我个人的认识主张,在第一节中,我在前人论述基础上,对“什么是政府”以及“我们为什么需要政府”问题进行了阐述;在第二节,我对“大政府,小政府”及其选择依据等问题进行了阐